

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
1982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

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编

1982年8月

编辑说明

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于本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在苏州市召开学术讨论会，到有来自全省各地三十多个单位的八十多位史学工作者。学会会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超，学会顾问、省社联副主席许符实、省高教局副局长李仲英，副会长盛仁东、江静、姜志良出席了会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师范学院、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和苏州地、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同志也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孙思白、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来新夏应邀来会并分别作了《历史与现实》和《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的专题报告。

讨论会收到论文五十八篇，自“五四”以至建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人物评论以及近现代史分期等方面皆有所论述。其中研究江苏地方史包括经济史的论文，占有相当的比重。与会同志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点讨论了关于江苏近现代经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江苏农民运动等三个问题。

为了交流研究成果，在所收到的论文中，选出十六篇，编印选集。限于篇幅，选刊的论文分别与作者协商，在文字上作了一定的压缩。有些论文，尚有待于进一步商榷和提高，敬祈史学界同志不吝指正。受委托担任编辑工作的是姜平、陈鸣钟、庄明坤、严学熙、孙士正、姚能等同志。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者水平的限制，疏失错误之处，请予批评。

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

一九八二年八月

目 录

略论研究江苏近现代经济史之意义	严学熙 (1)
概述无锡杨、薛、荣、周等资本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赵永良 (8)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的无锡缫丝工业.....	王赓唐 章振华 (17)
1912—1945年常州工商业、手工业概况	徐伯元 (25)
南通土布生产的历史片断	周月思 (32)
二十世纪初英美石油垄断组织在镇、扬地区的活动	郭孝义 (36)
论醒狮派	张圻福 (44)
驳张国焘污蔑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谬论	冯春明 (52)
张佐臣在无锡革命活动纪要	周玲梅 (59)
土地革命时期江苏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 姜志良 李学诚 陈鹤锦 王 楠 (62)	
土地革命时期的江苏红军问题	谈洪清 (72)
1935年刺汪案真相	强剑衷 (76)
蒋介石解决两广“六一”事变的方针和策略	陈鸣钟 (83)
陈毅同志领导盐阜区统战工作片断	沈长生 贾宗荣 (89)
解放战争后期的中国民主同盟	姜 平 (94)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应是现代史的开端	丁永隆 (102)

附：江苏省中国现代史学会1982年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

略论研究江苏近现代经济史之意义

南京大学历史系 严学熙

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论述研究中国近百年史时，把研究近百年的经济史放在首位。大家都知道，人类的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的前提和最基本的条件。人类社会的物质资料生产及随之而产生的交换和分配，即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即生产力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的阶级、阶级斗争和上层建筑诸方面，必须首先研究当时的农业、手工业、工业和商业，亦即当时的物质资料的生产。马克思说经济事实的力量“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一八四〇年，英国侵略者用大炮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的清帝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于中国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生产的发展”。（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尤其是棉纺织品的倾销，使以“耕织”结合为支柱的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城市的手工业遭到破产；外国资本主义掠夺中国的原料，又促使一些农副产品商品化。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中国的近代工业开始出现并有所发展。这一切都说明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已起了变化，在中国原来的封建经济中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从而使中国社会由封建的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了。

这一变化，经历了近百年的逐步演化过程。因中国幅员广大（在一八四〇年前后约有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现在则为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又划分出许多行省，这些省的地理、历史诸条件各不相同，因此上述演化进程在各地是不可能平衡的。在近代，当沿海省份商品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内地许多省份几乎还没有任何新的经济因素；就沿海各省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言，也并非并驾齐驱的。在沿海各省中，江苏则是社会经济最发展的省份。

《江宁条约》签订以后，通商口岸由原来广州一口扩展到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口，然而却“并没有造成五个新的商业中心，而是使贸易由广州移到上海”，（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并使上海成为近代中国最大的贸易中心。当时的上海属于江苏省，必然对江苏产生深远的影响，使近现代江苏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特别典型。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研究近代经济史，研究旧中国的生产力状况、国民经济状况，也就是研究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进行这种研究，有利于我们根

据实际情况制订经济以及政治、文化方面的各项政策。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经济问题时曾强调指出：党“为什么应当采取这样的经济政策而不应采取别的经济政策这个问题上，在理论和原则性的问题上，党内是存在着许多糊涂思想的。这个问题应当怎样来回答呢？我们应当这样地来回答，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们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和解决，是我党目前的重要任务。”建国初期，我们党正是从旧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的基本情况出发，制定了一整套切合中国“国情”的战略、策略和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胜利，举世瞩目。后来由于忽视甚至离开了这个“基本出发点”，任意地改变生产关系，其结果就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

同样，今日之江苏是历史江苏之延续，要加速社会主义新江苏的建设，必须了解其原有的基础和特点。在近现代，江苏的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均较发达，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远远超过全国的平均数，是中国社会经济最发达的省分。

就工业而言，江苏是中国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负隅力争的重要据点。江苏的民族工业主要集中在长江出海口两岸和上海的一个三角形地区。这里集中了中国民族工业的一半以上（有人说占70%）。纺织、面粉、缫丝是中国民族工业的三大支柱，也是江苏近代工业的主体。这三大工业的“大王”都出身于江苏，发祥于无锡。他们是“纺织、面粉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缫丝大王”薛南溟、薛寿萱父子。

中国民族工业是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重重压迫下艰难地发展起来的。然而，在同等条件下，各民族工业企业的命运却不尽相同。有些失败了，有些发展缓慢，有些则取得一定的成功。1894—1899年间江苏最早的三家纱厂就是如此：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创办的无锡业勤纱厂（1894年筹建）和陆润庠主持的苏州苏纶纱厂（1896年筹建），投产后不久即发生困难，改组或出租了；唯独张謇的大生纱厂（1896年筹办）取得成功，并续建了新厂。无论是张謇的早期成功，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成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之魁首和刘国钧的大成纱厂（在常州）的发展，还是薛南溟、薛寿萱父子登上中国缫丝大王的宝座，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如下四点：1.企业家本人懂得业务并亲自参加管理；2.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3.注意技术改革和生产管理；4.创立名牌产品和掌握市场动态等。而技术、管理、创名牌和市场调查等等都是由人来进行的。由此可见，即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企业家如果有事业精神，如果能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也能在三座大山重重压迫的隙缝中取得某些成功与发展。

除无锡、常州、南通等工业比较集中的城市外，江苏其它许多县市也建立了一些工矿企业。如南京的化学工业和水泥工业，镇江的缫丝工业，徐州的煤矿、铁矿和面粉工业，徐州、宿迁、丰县、泰州、泰兴、高邮、扬州等地的蛋粉工业，以及江阴、常熟、丹阳等地的纺织工业等等，都值得好好研究。另外，外国资本在江苏经营的企业还很少有人研究。

例如苏州的日商瑞丰丝厂，南京的英商和记洋行（蛋粉厂）等等。

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一些学术讨论会上，有些学者提出了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看法。这一观点是否全面？论据是否充分，尚须进一步探讨。共和国的建立，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从总体意义上讲对民族资本的发展是起一定作用的。然而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仅仅存在了一百天，特别是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因此，对各个地区的民族资本主义是否由此而得到发展，必须作实事求是的考察。辛亥革命与江苏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究竟如何？江苏民族工业发展的诸种因素及其最主要的因素又是什么？非经过详细地占有材料，并作出慎密的分析、对比、综合是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

江苏是近代中国农产品最富饶的省份之一。三十年代初，在全国农产品总额中，水稻产量占十二分之一，小麦占八分之一，棉花占五分之一，鲜茧占七分之一。自二十年代起，锡、常等地就开始了机电灌溉。解放前夕，江苏拥有的农用戽水机占全国总机数的一半以上。因此，在近代江苏的农业方面也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

再如，在土地制度方面，太平天国以后苏南地区租佃关系中的永佃权较为普遍，它在江苏近代农业经济中起了什么作用就需研究。在近代江苏农业产品商品化的发展过程中，蚕桑和棉花的商品化程度较高，其特点主要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从中国掠夺原料而引起的，尤以蚕桑为最明显，因而其盛衰也就随着国际市场的需求而变化。因此，要认识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发生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就不能不研究蚕桑、棉花和烟叶等商品化过程。1845年以后，江苏即形成了一个以无锡为核心的蚕丝产区，它对于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世纪初，中国农业经济中出现了一批农牧垦殖公司。顾名思义它当是资本主义的企业，但实质上除极个别的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农业企业外，绝大部分带有极严重的封建性，或者完全属于封建经济，甚至名为公司，实为租栈或土地投资公司。然而，它毕竟已不同于典型的封建生产关系了。在中国农牧垦殖公司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张謇的通海垦牧公司开了风气之先。到二十年代，在江苏北部沿海地带，南起吕泗，北抵阜宁，东至范公堤两侧，纵七百里，宽约百里的广袤地区内的二千多万亩海涂滩地上，建立了四十多个公司，投资三、四千万元。这些公司在三十年代虽相继失败，却为淮南垦区和江苏棉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江苏的皮棉产量在二十年代就突破了五百万担。对于这一问题还未见有较完整的研究。此外，弄清江苏四大农作物产区的形成、发展和特点，也是研究江苏近代经济史的重要方面。这四大农业作物区大致是：西起丹阳东至上海附近的稻丝区；南起上海附近北抵盐阜的沿海带江的棉花区；包括今徐州地区和淮阴、盐城地区大部的旱粮区和里下河地区以及宁、镇一带的籼稻作物区。

在手工业方面，苏（州）松（江）地区是宋元以来中国棉纺手工业的中心；以吴江县的震泽镇和浙江湖州南浔镇为中心的农民家庭手工缫丝业生产的辑里丝驰名中外。到了近代，苏、松一带农村家庭棉纺织手工业逐渐被破坏了，然而南（通）、如（皋）、海（门）一带的农民家庭棉织业却得到长足的发展，仅销往东北的关庄布一项，最高年产量就达六百万匹之多。还有常熟、江阴的手工织布业也盛于以往。震泽等地的手工缫丝业在1840—1930年间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有所发展，在中国出口生丝中占很大比重。如1880年中国出口生丝88,409担，其中辑里丝占24.55%。1907年，江苏一地的辑里丝产量就达14000担，

比1880年的5500担增长一倍半以上。我们还可以从宜兴陶瓷手工业生产中制作的汽灯头在与德国产品竞争中取胜的历史事实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通过对江苏近现代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农村的手工业，在一定时期和地区内，不仅不是迅速破产，而且还有所发展。在江苏本世纪二十年代（主要是长江口附近地区）农村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粮食生产，而是农副业和手工业。

在近现代江苏经济史上特别要提到的是，在苏南以无锡为中心的经济区和在苏北东南部以南通为中心的经济区。苏南的江阴、常熟、宜兴、溧阳、金坛的经济活动都围绕无锡而旋转、靖江、武进、吴县、吴江等县的一部分经济活动也以无锡为中心；海门、启东、如皋（包括今如东）、东台等县，乃至盐城、阜宁等地的重要经济活动，都围绕着南通而展开。

这两个经济区都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形成的。以无锡经济区为例，十九世纪中期，无锡还是介于苏州府和常州府之间的一个普通县分。十九世纪末，无锡城乡经济的发展逐渐超越苏常，到二十世纪初，更成为江苏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苏南经济区的中心。究其原因，主要为下述三点：1.无锡地近上海，水陆交通发达；2.本县和邻县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农民购买力较高；3.有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把资金转向工业。然而，此三条件不仅是无锡，而且苏州、常州也大致具备，特别是苏州官僚、地主比无锡更多，资金大大超过无锡。既然如此，为何苏、常的近代工商业没有无锡发达？未能成为苏南经济区的中心？对此，须从多方考察，试就无锡特有的条件略述之：

1864年（同治三年）清军包围“天京”，湘淮军即在无锡储囤粮食，1888年（光绪十四年），清政府正式规定江浙两省漕粮在沪、锡两地采办，无锡迅速地发展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粮行、储运、商业、银钱（金融）和服务性行业也应运而生。特别是回程的粮船总是从无锡捎带大批货物，无锡又成为日用品和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太平天国以后，无锡的蚕丝（土丝）生产迅速发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沪锡两地机械缫丝工业的发展，无锡及邻县武进、江阴、宜兴、溧阳、金坛等县的蚕桑业发展更快，而无锡的蚕茧产量“甲于东南”，并成为苏南蚕丝区的中心。茧行、茧栈、蚕种制造场等新的行业又以无锡为中心而兴起。每年流入上述各县农村的茧款约二千多万元，仅无锡一县就达一千万元左右。农民手上有了一定的现金，必然会购买较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无锡及邻县农村的商业活动也日趋活跃，从而形成了一批新的农村集镇，沟通了城乡物资交流。无锡也就成为粮食、蚕茧、工业品和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从而形成了一个以无锡为中心的广阔的商品市场，为民族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苏常所未能具备的条件。

在无锡建立最早的民族工业是纱厂（1894年的业勤纱厂），其次是面粉厂（1902年的宝兴面粉厂，即后来的茂新一厂），再次才是丝厂（1904年的裕昌丝厂）。然而发展最快，对无锡及邻县城乡经济影响最大的则是缫丝工业。据《无锡年鉴》统计，1929年底无锡十二个工业系统共有工厂208家，其中纱厂5家，面粉厂4家，缫丝厂48家，染织厂18家，机器翻砂厂67家，织袜厂14家，榨油厂8家，碾米厂14家，皂碱厂7家，制镁厂1家，造纸厂1家，织绸厂1家。总计资金额为11,771,440元，营业总额98,774,010元。

1936年无锡已是中国六大工业城市之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无锡的缫丝厂数占全县总厂数的23.66%，投资金额（2,388,000元）占总投资金额（11,771,440元）的21.29%，其营业额（54,084,000元）却占全县十二种工业总营业额（98,774,010元）的54.77%，超过纺织、面粉两大行业营业额的总和（29,289,500元）将近一倍。因此，奠定无锡早期工业基础的不仅是纺织、面粉业，更是缫丝业。无锡成为江苏（除上海）缫丝工业的集中地，缫丝厂数占全省总厂数90%以上。①既然如此，缫丝工业为何不集中于苏州或常州呢？尤其是苏州。诚然，江苏最早的丝厂确是建立于苏州的，那就是苏经丝厂（1896年筹建）。然而，却限于原料不如无锡充裕，缫丝工业在苏州发展不快，最多时也仅四个工厂，至于常州，则从未建立过缫丝厂。

自宋元以后，太湖流域的嘉兴、湖州（均属浙江省）和苏州（吴县）吴江是中国蚕丝的传统产区。自1845年上海开埠以后，生丝外销猛增，这里所产的辑里丝已远远满足不了国内外市场的需求。然而，吴县、吴江地势很低，除震泽附近和东、西洞庭山一带地势较高外，其余地区均不宜栽桑养蚕。于是，无锡、武进、江阴、宜兴、溧阳、金坛等县的蚕桑和土丝便应运而起。当机械缫丝工业在沪、锡等地兴起，出口生丝由土丝而逐渐转为厂丝时，辑里丝因质地好，售价高，在里昂生丝市场有传统的影响，而无锡等地的肥丝质量不若辑里丝，售价较低，更且每年六月初的缫丝季节适值农忙，劳动力有矛盾等，因此，当茧行兴起以后，农民宁可售茧而不再缫制土丝，沪、锡丝厂也就更重视在锡设行收茧，并逐渐扩展到附近各产茧县。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不仅江苏各县的大部分蚕茧，而且浙北、皖南的蚕茧均集中运锡储存，每年储存于无锡茧栈的乾茧达二十万担（约合60万担鲜茧）以上，约等于江苏全省的产茧量。其中一半运沪，一半供无锡各丝厂使用。由于原料充足一般丝厂经营者愿在无锡设厂而不取苏州。那么，常州宜桑，附近各县又是苏南蚕茧产区，为何不在常州设厂？发展缫丝工业除原料外，还要有澄清的水源。太湖水质澄清，最适缫丝用水，苏州、无锡都紧靠太湖，条件相当，然苏州原料（茧）的来源不如无锡，发展余地较小。至于常州，大部河道的水源来自长江、江水浑浊，不适缫丝用水。当时上海已有自来水，常州尚无条件，而且水费昂贵。因此，常州横林人许稻荪经营缫丝工业时，先在苏州租厂营业，不久即于无锡自建了振艺丝厂。无锡既有丰富的原料，又有澄清的河水，江苏的缫丝工业集中于无锡也就很自然的了。至于资金的来源和公路交通等无锡也优于苏、常，就不再论述了。第一、无锡是中国四大米市之一，第二、无锡是苏南蚕丝中心，第三、由于上述两点而使无锡成为粮食、蚕茧、工业品和土特产品的集散中心。这些条件是苏、常不具备的。因此，苏南经济区只可能以无锡为中心了。

研究无锡、南通两个经济区的历史和现状，将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例如，解放后设立的南通地区，基本上与原来的南通经济区相一致，这一地区经济上的传统关系得到保持，有利于今天南通市及其周围各县的经济发展。至于无锡为中心的苏南经济区，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原与无锡市联系非常密切的无锡县、江阴县、常熟县（包括沙洲）、宜兴县等，分别隶属于苏州和镇江两个地区，割断或影响了无锡市与这些县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折散了以无锡为中心的原有的经济区，从而影响了整个原有经济区各种优势的发挥。现今苏州、镇江两地区还未形成各自的经济区，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就不及南通

地区那么协调和平衡。常州正是借鉴了历史，在经济建设中创造了一条龙的经验，成为全国中小城市经济建设的典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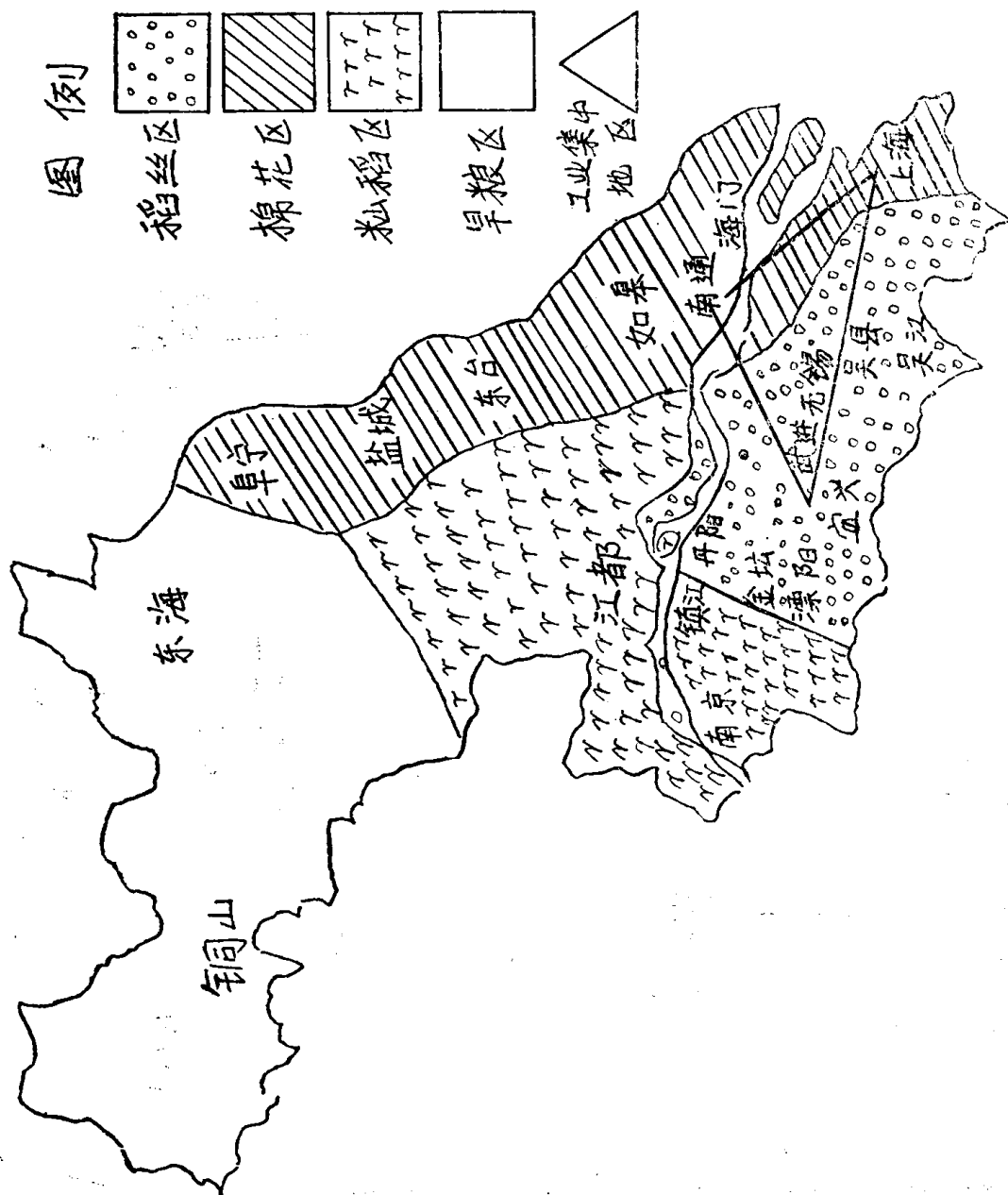
江浙一带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重点地区，除上海而外，江苏的苏州、镇江都有外国租界；这里又是官僚资本形成的大本营。另外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去研究。例如，一些原外国洋行的买办，本是帝国主义豢养的工具，可是其中一部分后来又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一定程度上变为外国洋行的对立物；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研究江苏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联系和矛盾以及三十年代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统制政策对江苏城乡经济的影响等等亦是具有全国意义的课题。

总之，研究江苏近现代经济史不仅是为了阐明近现代江苏社会经济的发展 和 变化 过程，同时也是深入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重要方面。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借鉴。不能设想，各级领导，特别是经济部门的领导，对近现代江苏经济史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而能够领导好本省、本地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都洞悉本地的经济史，但至少希望能有较丰富的知识。这就要求我们史学工作者对本省、地、市、县的经济史作认真的研究，使历史科学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

对于江苏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我刚刚开始，肤浅难免，谬误必多。但还是大胆地谈谈自己的一些初步看法，无非是抛砖引玉，取得同志们的批评指正，以利于今后共同对江苏近现代经济史作深入之研究。

①无锡集中了江苏茧行的一半，茧栈的全部，蚕种场的三分之一。

附：本世纪二十年代江苏省农业区域分布示意图



概述无锡杨、薛、荣、周等六个 资本集团的形成与发展

无锡市教师进修学院 赵永良

无锡是近代新兴工业城市，位于沪宁铁路中段，介于苏州和常州之间，可以说是苏南的经济中心。本文想就杨、薛、荣、周和二唐等六个主要资本集团以及祝、许、华、孙等几个重要资本家企业的形成与发展的史实，来探索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特点，以就正于专家和同志们。无锡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应该说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了。但是作为产业资本的兴起，则要到中日甲午战争后，即从1895年第一家资本主义企业——业勤纱厂的创办算起。辛亥革命前后，无锡主要几个资本集团就已初具规模，一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相当有名的实业家也在此时崭露头角，登上历史舞台，陈枕白在《往事与回忆》中写道：“三十年代前后，在沪锡两地经营工商业范围大并具有全国影响而称之为‘大王’的都是无锡人。如‘煤铁大王’周舜卿就是无锡东峰人。由于周舜卿发了财，他便出资经营东峰，同时把东峰改名为周新镇。‘丝蚕大王’薛寿萱，是清末出使英、法、意、比的四国大使、无锡官僚地主薛福成的孙子。他经营的丝蚕范围很大，自成系统，在美国纽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以及香港、新加坡等地都设有办事处。‘纱布大王’荣宗敬、‘面粉大王’荣德生，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经营的纱布、面粉行业，除在国内几个主要城市都设厂外，在印度支那、南洋群岛等几处主要商埠也都有分厂。以‘红兵船’、‘绿兵船’为商标的面粉，在南洋群岛一带销路很广，颇负声誉。在上海还有被称为‘桐油芋麻大王’的沈和生、沈瑞洲父子，也是无锡方桥人，他垄断着上海的桐油芋麻业，无锡的油麻业也颇受他的影响。以上几家民族资本家厂里的中高级职员，大都是老板的亲属亲信，不久，这些原来是中高级职员的人也都开店设厂，成为资本家了。”①钱锺汉的《无锡五个重要产业资本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一文，则为本文提供了相当宝贵的资料。

关于无锡地区资本集团及资本家企业的起家与形成问题。

一、杨氏资本集团。是无锡最早出现的产业资本集团。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是无锡著名的地主。父杨延俊当过山东肥城知县，“置田二百亩”，与李鸿章为旧交。因此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得入李鸿章幕府，为洋务派重要人物。太平天国后期，杨宗濂以在籍户部员外郎身份，“偕同苏绅赴皖迎师，照料军粮，雇备轮船各事……旋即招募营勇一营，自行筹捐口粮，协同攻剿，奋勇出力。”②因此，擢升道员。1882年因事被革后，复任台湾水陆营务处兼办台南北铁路，并总办“商务洋务”，“兼开埠事宜”。1887年诡名杨鼎祺，号保芝堂，与汇丰银行买办德人穆麟德集资开设天津自来火公司。穆无故抽股，复邀盛军统领周盛波入股，遭到别人控告，说他“官府其身，而市侩其行”1891年李鸿章想借

杨在商人中的声名招集股金，委托督办上海机器织布局（他本人因常在北方，具体事情则由弟杨宗瀚负责）。后因资本不够，官位不高，受到排挤。1893年，织布局遭火烧。李鸿章委派任长芦盐运使。杨宗瀚官至河南遇缺题奏的官，先协助其兄，任上海织布局会办，后与其兄一起经营纺织业。杨氏兄弟创办的业勤纱厂，在民族资本创办的纺织行业中，仅次于上海朱鸿度办的裕源纱厂。杨氏子侄辈杨翰西、杨味云相继创办广勤纱厂、广丰面粉厂以及其他企业，使周山浜地区成为闹市区，并在上海、江阴创办或合办纺织厂。杨氏一支杨味云在天津华新纺织系统中拥有较多股份，因而杨氏集团成为全国著名纺织钜子之一。

二、薛氏资本集团。薛南溟、薛寿萱父子以永泰丝厂为中心，发展成为无锡最大的丝业资本集团。薛氏起家也为官僚地主。有人考证，清乾嘉之际，“无锡薛某以开设当铺及贩运粮食起家，先后买田四万亩，收租2—3万石”。^③故有“薛仓厅”之名。薛南溟之父薛福成，以副贡生于1865年入曾国藩幕。长于文字，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后又在李鸿章幕府办理洋务，与曾纪泽、郭嵩焘、马建忠等同为洋务派著名喉舌。又出使欧洲多年，受欧风美雨影响，转化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其子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有相当影响。薛南溟中过举人，因父荫，投入李鸿章幕府。李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时，他以候补知县衔任天津县道府三署发审委员，专门从事华洋讼事。薛不满于此，乘父亡奔丧回乡，回家开设茧行并收租剥削。1896年，与周舜卿合作在上海开设永泰丝厂，1926年迁回无锡。到其子薛寿萱时，规模更大，被誉为“丝蚕大王”。薛氏父子，财多势众，始终是当时无锡城乡地主豪绅和资产阶级的首领人物。薛氏的丝业，后来不仅几乎垄断了无锡的丝茧行业，进而控制了苏浙皖的大批茧行^④，并且在欧美设立办事处和代办机构。

三、荣氏资本集团。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无锡荣巷人，在无锡、上海等地创办的申新纺织系统和茂新、福新面粉系统，规模之大，财力之盛，在全国民族资本中首屈一指。荣氏祖父在太平天国时开始做贩运生意。父荣熙泰做过铁铺学徒，曾在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过帐房，后来跟随太湖水师提督王青山到广东。结识了以知府衔到广东候补的太仓人朱仲甫，先后在广东一些地方任税官十余年。有了相当积蓄后，到1895年离开，于次年赴上海，与人合开广生钱庄，以此起家。1900年，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无锡创办保兴（即后来的茂新）面粉厂，先后得到朱仲甫、祝大椿、荣瑞馨等人支持，于1905年在无锡集资创办振新纱厂。荣氏兄弟还在上海和无锡等地陆续创办规模更大的申新纱厂和茂新、福新面粉厂（荣氏自称为“三新”）。到其子侄一辈，荣氏集团还投资于机器业、水泥业、麻棉业和金融业——上海银行和中国银行，还从事智力投资——开办公益中学和江南大学等^⑤，被称为全国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

四、周氏资本集团。周舜卿无锡东埭人，是无锡第一家丝厂——裕昌丝厂（1904年）的创办者，上海大明洋行的买办。人们认为周舜卿和薛南溟父子对无锡资本主义缫丝工业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周舜卿无论在无锡或上海，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中一位老前辈，人们都以一识为幸。关于他的起家，据其子替他做的“行述”中说：“同治丁卯（1867年），海宁（内）承平，府君始随从堂叔祖挈沪习商……负笈西校，肄业三年而

成。有英商帅初者，贩铁为业，一见府君，即器重之，为筹五千金，怂恿自主一店，借资联络”。于是在上海设立升昌铁号，“不数年而信用大著，因而牛庄、汉口、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外而日本长崎，均次第扩充分号，以资转输”。周氏从起此家。1896年与薛氏一起在沪创办永泰丝厂，后又从事于金融业，1907年在上海开设信成商业银行，并兼营其它行业。辛亥革命前，他和同乡祝大椿成为上海地界少有的几个百万富翁之一，并以余资在家乡创办裕昌丝厂和开辟周新镇。他和儿子周肇甫一起在裕昌丝厂的基础上又在无锡发展了两个子厂——慎昌丝厂和鼎昌丝厂，此外还在上海开办大有油厂，在无锡开办裕昌米厂和广昌煤铁号，在创办资本主义企业活动中，周结识了满族亲贵奕劻父子，并得到其支持，清朝赏给他四品京堂的官衔。

五、唐蔡资本集团。以庆丰纱厂为中心的唐保谦、蔡兼三两家始终合作，后来还结成亲家，因此作为一个资本集团来叙述。该集团和以丽新纱厂为中心的唐程资本集团，都是继荣氏集团以后而兴起的。申新、庆丰、丽新纱厂，后来即被改造为无锡国棉一、二、三厂。唐氏祖父唐懋勋为常州商人，太平天国前迁无锡，开恒升布庄，后避乱迁严家桥。唐保谦之父唐子良，已是严家桥地主兼砖瓦窑主，后来在无锡开设米行、堆栈。以此起家。蔡兼三早年从商，先营复生堆栈，又开茧行获利，并任周庄信成银行无锡分行的副经理，遂与唐氏合资开设无锡永源生米行，1909年合资创办九丰机制面粉厂。唐氏又另创办润丰油厂、锦丰丝厂和利农砖瓦厂等，蔡氏则和孙鹤卿等合资创办耀明电灯厂，并投资于周舜卿的裕昌丝厂。1921年唐蔡合资创办庆丰纱厂。到其第二代，即唐星海、蔡漱岑时，庆丰业务获得较大发展，先后在上海创办保丰纱厂、协丰毛纺厂、苏州太和面粉厂、香港南海纱厂及其它企业，在无锡纺织行业中成为仅次于荣家的一个资本集团。

六、唐程资本集团。唐骧廷和程敬堂为丽新纱厂创办人。唐骧廷也为无锡严家桥人，与唐保谦为堂兄弟，但资本各成系统，互不相关。唐骧廷和他主要资本合作者程敬堂，都是绸缎商人出身。唐氏祖父作棉布生意。程氏原籍安徽婺源，为著名的徽商后裔，祖先原为大地主，后来经营木材而定居无锡，原在人和绸庄当店员，后来到唐氏的九余绸布庄做店员，并被邀入股，唐、程以此起家。1917年接办丽华布厂，1919年开设丽新机器染织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继申新、庆丰纱厂后第三家最大的纺织厂。其第二代唐君远、程景溪业务获得很大发展。唐氏另一支唐君远、唐能源又集资开设无锡第一家毛纺织厂协新毛纺织染厂。抗日战争时期，还在上海租界内开设昌元纺织染织公司，分设纺、织、印染三个工厂。

以上就是无锡六个主要资本集团概况。下面简单交待一下其他几个资本家企业情况。

祝大椿，无锡伯渎街附近人，和周舜卿一样，也是在上海滩上少有的几个百万富翁之一。关于他的起家，据其子祝伊孚说：祝大椿1855年生于无锡，1872年去上海，在旧铁行中习业。1885年前后，由他母亲多方拼凑了约一千元资本，开设“源昌号”，经营煤铁五金⑥从此起家，后来当上海怡和洋行买办发了大财。他于1888年创办源昌机器碾米厂，1894年创办源昌机器缫丝厂。又与人合资创办华兴机器面粉公司、公益机器纺织公司、怡和机器皮毛打包公司。在这些企业中他的资本占一半。1909年又和顾敬斋合资在锡创办源康丝厂，1913年又与人合资在锡创办乾元丝厂和惠元面粉厂，并设堆栈多所。在苏州和常州也

有工业投资，据说他还任沪宁铁路会办（总办为盛宣怀），利用职权在家乡建立无锡南站，以利其商业活动。他曾捐道台衔，并和周舜卿一样，清政府赏给他二品顶戴的衔头。

许稻生、武进横林人，出身钱庄职员，帮助上海洋行买办在无锡开设茧行而积累资金，1881年和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丝厂时许稻生即在该厂工作。1910年在无锡开办振艺丝厂，资金10万两，丝车500台，为无锡丝厂行业中创办较早、资金最多、规模最大的一家。后来分为振艺诚记、振艺协记。1929年，两家资本合计达21万元，有两个工场，丝车776台，仍然是全行业中最大的一家。许氏在无锡产业资本中占有一定地位，可惜工厂在抗日战争中遭日军火烧，加上子孙不善经营，许氏资本从此就销声匿迹。

孙鹤卿、无锡石塘湾人，1909年开设乾生丝厂，并与人合资创办耀明电灯公司。在庆丰纱厂中也有较大投资。石塘湾孙氏家族和荡口华氏家族，为无锡最大的世族地主，向有“南华北孙”之称。太平天国失败后，无锡、金匱两县为办理军事善后成立恒善堂，两个乡绅的堂董就是孙氏与华氏。孙鹤卿因堂妹夫叶恭绰的关系，担任沪宁铁路路勘路委员。因事先获悉无锡车站所选地点，就在此南面购置大批荒地，经营地产，并在部分地产上建店屋住房，由此起家并从事工商业。石塘湾车站也出于同样的谋略而建立。孙氏家族中，只有孙鹤卿投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而发了财，成为族中首富，进而与薛氏、周氏结合一起，成为无锡实力派人物。孙氏企业到第二代，其内侄程炳若（无锡东亭人，经营蜡烛的资本家）时，乾生丝厂曾获得较大发展。

华绎之为荡口人，以经营养蜂、养鸡发财。他的蜂蜜行销全国和南洋一带，因而被誉为“养蜂大王”。荡口为华氏世族地主聚居之所，华翼纶在太平天国时曾组织地主武装“白头”军，以荡口为据点，与太平军进行的长期对抗，后在李鸿章的上海轮船招商局工作。（二子华蘅芳、华世芳，为近代著名科学家）这对华绎之经营农业资本主义不无关系。华绎之起家，则因为他经手荡口仓厅一万亩田的收租事务，从中积累资金，先创办养蜂场，获利后在无锡创办宏绪宏裕丝厂，建造了较大堆栈及其他商店。但他的丝厂自己不缫丝，专门租给别人以收取租金，成为无锡第一隐富，所以华绎之当被视作农业资本家。华氏在锡开辟新市场（今惠农桥堍），熙春街和龙船浜的商业繁荣，也与他经营商业有关。华绎之及其儿子并去美国创办豆质公司，因之华绎之在无锡资本主义发展史上仍应有他的地位。

王尧卿、王禹臣兄弟，蠡园人，在锡创办赉裕布厂，在沪创办面粉厂，规模也很大，浦文汀、漆塘人，在锡创办恒德油厂，资金10万元，规模为关内第一，但皆为荣氏资本集团的投资者或合作者，不足以单独构成资本集团。杨冠常的豫康纱厂，资金115万元，孙伯华的泰隆面粉公司、资本20万元，也为无锡地界规模较大的厂。此外还有沈和生、沈瑞洲父子，无锡方桥人，在上海开设沈源来油麻号，成为“桐油芋麻大王”；丁厚卿丁巷人，在上海创办福新烟草公司，规模仅次于简氏兄弟的南洋兄弟大烟草公司；丁荣照、匡仲谋皆为杨墅人，丁氏在沪创办大无畏电筒厂，规模很大，匡氏开辟上海南门蓬莱市场、为商业大资本家、陆培芝，东大池人，为上海杨树浦铁行大老板，他们都曾在其家乡创办过一些企业、商店堆栈、学校以至公园，但规模都不大。上海还有许多工商业资本家为无锡人，这里就不一一论述了。

关于无锡地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特点问题：

第一，从上述资本家的起家及资本集团的形成的史实中可以看到，无锡资产阶级同我国一般民族工业资产阶级一样，绝大多数为城乡地主官僚买办和商人转化而来，这与欧美不一样，几乎没有一个是从手工业工场或手工业作坊主起家的。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定历史条件决定的。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自从中国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漩涡以后，封建统治阶级想要继续完全维持其旧的生产方式已不可能了，逼得他们（当然只是其中一部分，）在灭亡的恐怖下转而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积累起的财富的一部分转化为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也有一部分则是被诱于资本主义的高额利润转而投资于民族工商业的。要指出的是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又曾还原于封建地租剥削，这也许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又一特点。

应予指出，明清以来无锡为著名的“布码头”和米市，布商粮商财多势大，但是除丽新纱厂创办者唐程氏为绸布商出身外，无锡著名的大粮商赵氏，大陶商蒋氏，钱庄业单氏，则较少投资于近代企业，倒是地主官僚买办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投资者。这种现象如何理解？在我看来，中国长期为封建社会，地主官僚有社会地位，财力也较雄厚，他们投资于资本主义并成为民族资产阶级，比较方便，阻力较小，而且比较经得起来自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力和冲击而站稳脚跟，不象商人和手工业者那样转化为工业资产阶级那样，财小力弱，经不起风吹雨打。这也许是中国或所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共同的特点吧。还应指出，无锡世族地主（多住东北乡），很少投资于近代企业；南乡西乡新兴地主则较多从事近代企业；一部分与洋务派有密切关系的官僚地主，较早地从事资本主义工商业；而与洋务派没有关系的官僚地主，则也很少投资于近代企业。至于以周氏、祝氏为代表的买办资本，则也在辛亥革命前后，把大部分积累逐步转化为民族工商业资本，成为民族资本家，说明在当时中国这块土地上，买办资本家可以转化为民族资本家。就中国第一个民族资本家陈启源（因创办继昌隆缫丝厂而闻名中国），到他的孙子陈廉伯一代，则转为广州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在大革命时反对孙中山，因为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第二，无锡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别的地区的不同之处，就是发展比较迅速。抗日战争前夕，它被人称为“小上海”，国民党政府也把无锡和南通称为“模范县”，原因何在，值得探讨。

无锡地处太湖之滨，自然条件比较好，水陆交通又比较便利。无锡为有名的“布码头”和米市，轻纺工业所需的原料及米麦比较丰富，便于就地取材，铁路、公路、运河四通八达，商品销售市场也比别地优越。就劳动来源说，也比上海等地方便，无锡农村地少人多，农村中雇农比重较大，加上邻县和苏北又有较多流亡农民来锡，工人来源供过于求，使资本家有条件以较低工资购买劳动力，就以1923—1924年间丝厂工人工资来说，无锡要比上海低5%—10%。

无锡又有发达的堆栈业，而堆栈和仓库又和金融资本有密切关系，很多就是银钱业本身投资的，他们一面租给厂商堆储粮食和干茧，收取租金，一面通过仓库大做押款，收取高利息，控制押品，同时又做存栈商货，代客保险，收取保险佣金。一本三利。但在厂商方面，则可以存栈的栈单交银行做担保品，一般垫头三成，即可向银钱业借款七成，凑足十成周转资金。因而可以集少量资金开厂营业。是时无锡一些实业主的厂房设备可供租借，毋

需投资建造，开工营业后最主要的两项成本支出，都是先使用后付钱。工人工资要做满45天后才发一月工资，煤费则包给煤商，使用一月后再支付，这些都是厂商加速资金周转的有利条件。

无锡的兴起，与上海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无锡是上海的卫星城市之一，但上海处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压力之下，民族资本主义处在直接受威胁的地位。无锡则“天高皇帝远”，与帝国主义直接关系较少，还有回旋的余地，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无锡的茧与丝，纺与织，谷与米，麦与粉，都直接发生关系，不象上海那样一切依赖外地。当然无锡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广大工人残酷剥削和对广大农民残酷压榨的情况下获得的，这点我们不能忘记。

第三，无锡上述资本集团的发展，从1895年业勤丝厂创办起，到1949年全国解放止，经历了半个多一点世纪。大致说来，太平天国以后到中日甲午战前，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诞生成长时期；甲午战后到辛亥革命前为其发展时期；辛亥革命到1930年可说是其“黄金”时期；其后经历了一段困难，1935年后又有所发展；抗日战争到解放前夕为其衰亡时期，资料表明：无锡杨薛荣周和二唐等资本集团，他们的先辈或本人大多是在太平天国以后从事商业活动以积聚原始资本的。中日甲午战后，无锡和全国一样，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下面借用钱文统计资料以说明问题。

1895年到1936年四十年间，六家工业系统的资本一共增长了四十八倍以上（38万元与1890万元之比），其中1902—1911年间增长2.5倍，1911—1920年间增长2.8倍。1920—1928年间增长76%。抗战前七年间又增长了一倍。从各家资本来看：杨氏在四十年间增加4.3倍（24万两到24万两又150万元），薛氏从1909—1936年间增长约8倍（从12万两到29.28万两又113.5万元），周氏从1904—1936年间增长约3.8倍（8万两到30.5万两）。荣氏在三十六年间增长190倍（从3.9万元到750万元），唐蔡系统增加15倍（从20万两到300万元），唐程系统则增加100倍，（从4万元到444万元）。

为什么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呢？因为中日战后，条约规定帝国主义可以在华任意设厂制造，中国社会经济日益陷于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下，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政府才不得不改变历来重农抑商传统政策，1895年，诏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无锡第一家工厂于1895年创办，到1911年发展到十一个厂，投资总额达116.7万元（两）。

辛亥革命以后到1936年，无锡民族资本主义达到繁荣时期，这是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二千年来的封建帝制，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了《临时约法》及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条例，无疑对于打破旧的生产关系桎梏，解放生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也给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带来了有利条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这个时期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的，尽管军阀混战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及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速度是缓慢了下来，但上述统计数字表明，无锡民族资本主义仍在继续发展，民族资本投资数仍在成倍地增长，那种认为1920年或1929年后民族资本主义已经走向没落或下坡路的观点不尽正确，至少在无锡地区不是这样，只是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才遭到毁灭性的

打击，并从此一蹶不振，（钱锺汉的文章已有详细说明，这里不再引述。）无锡地区的例子是很能说明这点的。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全面内战和大规模的搜括政策，无锡民族资本主义遭到很大压抑，只有荣氏和二唐工业系统基本得到恢复，荣氏在锡的工业资本系统到解放前夕，可能超过战前（除去申新三厂纱锭增加外，还开设了开源机器厂和无锡棉麻毛织厂），但杨氏、薛氏则已失去了战前的势态和地位，周氏、祝氏、许氏则已倒败，孙氏则已转让给其内侄程炳若，华氏农业资本主义及其商业活动也不如以前了。

第四、一般说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规模不大，资金不足（与帝国主义在华企业或官僚买办企业相比），因而在中国近现代政治舞台上不能起决定作用，但是它和欧美资本主义一样，不断演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过程。因为既然是资本主义，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经济规律便不会不起作用。例如荣氏申新纺织公司先后兼并上海恒昌源纱厂、德大纱厂、常州纱厂、三新纱厂，到1931年，仅直属九处工厂便拥有纱锭40余万枚，布机4700台。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阜新面粉公司两个集团，在抗战前夕产量占全国的40%—50%。荣氏“三新”和上海永安系统、南通大生系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启新洋灰公司、久大精盐公司、大中华火柴公司、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等一样，走着同一条路。

无锡其他民族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也是这样。据1930年出版的《无锡年鉴》统计，当时无锡有各类工厂208家，分属十一个行业，全部资金总额为11,771,400元，但如上六家资本集团和祝许孙三个资本家企业（华绎之系统不算在内），共计17厂（耀明电灯厂不在内，）合计资金7,737,800元，占全部资金总额64%。据1935年《无锡概览》统计，当时十几个行业，193个企业全部资金总额约1,820万元左右，而上述九家资本集团所直接掌握的24个企业资本合计竟达到1,356万余元，占当时全部工业资本74%强。1935年以薛氏为首组织的兴业公司，控制了无锡十六家丝厂，丝车共计6千台，每日产丝85担，可算又一个典型。

另据钱锺汉对1934年杨薛荣周及二唐六家资本集团的情况统计表明：当时无锡食品工业（碾米、面粉、榨油）的资本额达224万元，占当时无锡工业总资本12%强，而其中和六个资本集团有直接关系的资本为184万余元，占食品业总资本额67%强。棉纺染织业资本额为1,237万元，占无锡工业总资本70%不足，与六家直接有关的资本为1,215万元，占纺织业资本总额的97%。缫丝业资本总额为310万元，占无锡工业总资本17%左右。其中与六家直接有关的资本为118万元，占缫丝业资本总额37%强（1935年薛氏兴业公司成立，上升至50%强），机器制造业（包括翻砂）资本总额15万余元，占全部工业总资本1%不到，与六家有关的资本为2万元，占机器制造业资本总额13%不足，其他工业（针织、化工）的资本总额为34.8万元，占全部工业资本的2%不足，与六家有关的资本为16万元，占其资本总额的46%，以上可见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一斑。

第五，从无锡资本集团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关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为了争得自己生存发展的权利，一般说来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过相当坚决的斗争。无锡第一家私人企业——业勤纱厂开办过程中，因为资金不足，又无设备，十分困难，从杨氏子孙为其祖辈所作行述中可以看到“洋商追呼，时时恫吓”、